

欧洲一体化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曹 蕾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建交50年来,中法关系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呈现出关联性特征。两者的关系受到中法双方追求独立自主和多极化战略目标的观念性因素、欧盟成员国对外政策“欧洲化”的制度性因素和国际形势演变的环境性因素的约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未来中法关系将维持现有的战略基础,同时也将受到欧盟机制和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 欧洲一体化;法国外交政策;中法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9.565;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6-0054-05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hina - France Relations

CAO 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fifty years ag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France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have been interacted gradually, showing a certain nature of correl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rocesses has been deeply constrained by three factors. They are conceptual factor which is reflected by facts that both France and China constantly pursued interdependence and multi - polar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stitutional factor which is reflected by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ies of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 which show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future of China - French relations will maintain its strategic foundation.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EU mechanism and policies will also affect China - France relations.

Key words: European integrati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 China - France relations

自1964年建交以来,中法关系在5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二战以来,随着欧洲联合进程的发展,中国同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日益受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被纳入整体性的“中欧关系”框架,欧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也受到欧盟因素的影响,“欧洲化”的特征突出。^[1]本文以二战后历任法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为截面,对欧洲一体化和中法关系进行梳理,以总结出两者之间重要的关联性因素,并从欧洲一体化发展角度对中法关系进行展望。

一 欧洲一体化和中法关系发展的进程

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和中法关系并行发展。这两个进程从起初的各自独立发展,到后来的紧密结

合,彼此影响,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政府意识到在冷战条件下要恢复大国地位和解决同德国的关系,必须借助欧洲联合的力量。1951年,法国联合西欧5国签订了《巴黎条约》,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1957年,6国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此时期,法国政府出于对印支战争的考虑,仍同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但也认识到新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中法之间的民间交往得到迅速发展。到1963年,法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已超过同台湾的贸易额。

戴高乐于1958年重掌法国政府后,将维护法

收稿日期:2014-09-10

作者简介:曹蕾(1976-),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制度、欧洲一体化。

国的“独立”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他说,“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干什么,和同谁干什么,而不是任何国家或任何集体强加于我们”。^[2]¹⁰⁴戴高乐强烈反对欧洲一体化日益浓厚的超国家倾向,坚持本国利益至上,但接受了通过欧洲联合主导欧洲事务的思想。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欧洲一体化遭遇“空椅子危机”的挫折,导致了决策权向成员国倾斜。1964年1月,中法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被誉为“外交核爆炸”。

蓬皮杜执政时期,欧洲一体化缓慢前行。法国调整政策接纳英国,欧共体从6国扩大到9国。蓬皮杜坚持推动欧共体的“深化”进程,启动经货联盟建设步伐,同时积极推动政治联合。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中国同西欧国家出现建交高潮。法国利用其第一个打开对华关系大门的有利地位,推动中法关系的发展。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法国投了赞成票。1973年9月,蓬皮杜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会见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时期,中国基于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多极化、独立自主的原则,对欧洲一体化表达了支持。欧洲一体化和中法关系由两个彼此独立的进程逐步向紧密相关的方向发展。

德斯坦继承了戴高乐主义传统,反对超国家色彩的“联邦欧洲”主张,坚持“法德轴心”策略。这一时期,欧共体创立了欧洲货币制度,向建立经货联盟迈开重要的一步,并且普选产生了欧洲议会。德斯坦执政时期,中法关系稳定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市场对法国更有吸引力。1975年5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法国,双方决定成立经贸混委会,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1980年10月,德斯坦正式访华。

密特朗担任法国总统后,在外交政策上全面继承了戴高乐的思想,认为法国是全球性的小型“超级大国”,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特殊作用。^[2]⁴⁰⁷密特朗任期内,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突破。欧共体通过《单一欧洲法令》,提出建立经货联盟路线图。冷战结束后,法国推动建立起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最终在1991年催生《欧洲联盟条约》。密特朗执政前期,中法关系获得平稳发展。1983年5月,密特朗访华,邓小平会见密特朗时强调“我们欣赏法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也是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3]1987年11月,李先念主席访问法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法。双方经贸和各领域合作也显著发展。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

法国先后向台湾出口护卫舰和战斗机,使中法关系陷入停顿。1993年3月,右翼的巴拉迪尔担任总理,决心修补中法关系,1994年1月,中法发表联合公报,法国承诺不向台出售武器,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法国首次公开明确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义务。中法关系得以恢复,回到正常轨道。

1995年,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欧洲一体化进程和中法关系都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希拉克具有强烈的大国意志和历史使命感,同时也认识到法国的强大离不开欧盟的支持。为此,他实行了一系列推动欧盟发展的政策。^[4]法国积极支持欧盟机制改革和政治联合进程,力推《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和《宪法条约》出台。但是2005年5月,法国在全民公投中否决了《宪法条约》,使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希拉克依托对欧盟的影响力,制定了把法国建设成为“有分量”大国的多极化外交战略。^[5]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以法国为首的部分欧盟国家坚决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在对华政策上,希拉克积极推动建立法中、欧中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5月,希拉克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中欧签署了《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最高定位,促进了大国关系的互动和调整。^[6]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将中法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7年5月,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他坚持推动修改《宪法条约》,取消部分超国家性质的内容。2007年出台的《里斯本条约》平衡了欧盟内部意见,标志欧洲一体化进入新的阶段。2008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欧盟经济陷入停滞,制度缺陷充分暴露,一体化进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欧债危机改变了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法德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萨科齐在经济治理和危机应对方面对德采取妥协,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采取强势进取态势。^[7]法国联同英国领导了利比亚战争,显示出强硬的干涉主义路线。萨科齐上台之初比较重视中法关系,延续了希拉克的对华友好政策,并于2007年11月成功访华。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中欧关系整体环境恶化,法国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严重摇摆。萨科齐先是表示将“抵制”北京奥运会,后又于中欧领导人会晤前夕高调宣布会见达赖。中方作出强烈反应,宣布推迟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国的坚决反击迫使法国

修正错误立场。2009年4月,中法发表联合声明,法国就西藏问题申明立场,标志中法关系得到恢复。2010年4月,萨科齐访华并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11月,胡锦涛主席应邀访法,法国给予最高规格接待。双方就共同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2011年法国担任G20主席国,萨科齐两次访华,就重大国际问题同中方沟通,中法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增强。

奥朗德在2012年大选中击败萨科齐。同时,欧盟经济仍深陷危机,欧洲一体化继续步履蹒跚,内部关系更加复杂。这种情况下,奥朗德作为戴高乐-密特朗主义的继承者,主张通过适当的刺激推动欧盟经济复苏,强调法德关系的“平衡性”。^[8]随着欧盟凝聚力下降,法国外交更注重“独立性”。奥朗德提出“经济外交”的目标,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重视同新兴国家的联系。在此背景下,中法关系务实特征更加突出。2013年4月,奥朗德访华,成为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接待的第一位西方国家元首。中法重申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并就加强经济关系,扩大务实合作领域达成广泛一致。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领导人表示将中法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先取向,共同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二 欧洲一体化对中法关系的影响因素

欧洲一体化对中法关系的影响从弱到强,二者由各自发展到紧密联系,其间受到各种关联性因素的影响和推动,这些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既来自双方的政策理念,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欧盟制度变迁的作用。

(一) 观念性因素

对法国和中国来说,双方关系的最重要基础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支持和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中法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分属不同的阵营,但是战略理念的共识始终超越双方的分歧,成为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最强大动力。欧洲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改变国际格局、推动多极化发展的长期性因素,一直得到中法双方的认同和支持。

对法国来说,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和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并在欧洲发挥主导作用是其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二战后,推动和主导欧洲一体化,借助欧洲整体力量实现法国的战略目标,是从第四共和国到奥朗德政府的一贯政策。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则被戴高乐以来历届法国领导人

视为构建整体国际战略,打破超级大国或国家集团垄断性地位的重要内容。

对中国来说,发展同法国和欧洲的整体关系是调动大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多极化的重要手段。中国领导人很早就注意到西欧联合的巨大影响,将其同反对美苏霸权,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统一起来。1972年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对欧共体的扩大做了积极评价,指出“你们现在同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大团结、小吵架”。^[9]1973年,周总理向访华的蓬皮杜表示,中国支持欧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欧洲团结的事业有助于欧洲和世界局势的改善。^{[2]356}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中方逐步将同欧洲国家的关系纳入到中欧整体关系的范畴来考虑。法国作为欧盟中举足轻重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奥朗德时表示,中法都是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国,都致力于国家发展振兴、人民幸福,都主张世界多极化,都坚持多边主义。双方将本着互利共赢精神,推动中欧关系不断向前发展。^[10]

(二) 制度性因素

除了观念性因素外,欧洲一体化同中法关系相互作用的直接因素是欧盟(欧共体)机制的变化对欧洲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即欧盟成员国对外政策的“欧洲化”现象。所谓“欧洲化”,是指欧盟成员国的身份所导致的行为体在政治和政策上的变化。^[11]

法国对外政策虽然长时间“以我为主”“特立独行”,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发生了“欧洲化”现象,在目标、政策、手段上同欧盟整体相趋同,这既包括“自上而下”的由欧盟机构层面到法国政府层面的影响,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法国对欧盟整体政策的影响和塑造。

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协调起步于早期的西欧政治联合进程。蓬皮杜时期,在法国的推动下,欧共体6国决定建立由成员国外长参加的、专门协调外交政策的政治合作制度。1973年,欧共体9国进一步提出扩大外交政策协调的范围,并确立了领导人定期会晤的制度。1973年12月,欧共体首脑在哥本哈根举行会晤,正式提出了“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口号。德斯坦时期,法国积极推动设立了“欧洲理事会”制度。在此阶段,法国已显示出将外交政策“欧洲化”的意图,即自下而上地推动欧洲层面的外交政策协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洲一体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法国同欧盟之间“自下而上”的“欧洲化”进程更多为“自上而下”的进程所代替。密特朗时期,《欧洲联盟条约》正式将欧洲政治合作进程改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规定在重要决策上实行一致同意原则,在特定领域内采取“特定多数表决机制”,大大提升了各成员国在对外政策领域进行协调的制度化水平。希拉克时期,《阿姆斯特丹条约》设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职务。尽管按照欧盟条约,成员国对于外交政策具有最终决策权,但机制性措施让各国难以完全自行其是,不得不考虑其他成员国和欧盟整体的立场,否则将招致严重的政治纠纷。

进入21世纪,欧盟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内部决策更为复杂,《里斯本条约》设立了对外代表欧盟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职务,合并了原有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委会对外关系委员职务,成立欧盟对外行动署。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欧盟的政策协调能力,强化了欧盟机构对外交政策的协调力度,对各成员国的外交政策间接施加影响。

随着“欧洲化”进程的推进,法国对华政策逐步同欧盟整体对华政策相联系,欧洲一体化对中法关系的影响更加明显。1995年欧委会发表题为《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的首份对华长期政策文件,将对华接触战略作为欧盟的长期目标,又于1996年发表了《欧盟对华新战略》。与此相呼应,1997年中法确立了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欧委会即发表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政策文件,将对华关系提升到与美、俄、日同等重要的水平。2003年欧盟发表首份《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同年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双方决定共同致力于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在“国际热核试验反应堆”(ITER)选址问题上顶住美国压力,拒绝了日本、韩国方案,而支持将地点设在法国。2003年12月,在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倡议下,欧盟首脑会议责成欧盟外长理事会重新审议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中欧和中法关系形成了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局面。

(三) 环境性因素

在欧洲一体化和中法关系相互影响和联系的过程中,国际形势发展演变带来的环境性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在20世纪50-60年代,冷战和美苏对峙是主导国际形势的根本因素。对法国来说,西欧联合为

其提供了发挥影响、实现抗美独立目的的机会。在戴高乐任内,法国做出了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的惊人决定。戴高乐还积极推动法国独立核力量的建设。中法当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相似,都反对美苏主宰世界,双方得以突破不同阵营的束缚,开创性地发展关系。

70年代,冷战一度出现缓和,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利造成国力衰落,国际格局开始出现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势头。在此背景下,法国主张进一步推进西欧联合以便在多极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同西欧国家和欧共体建交,使得中国能够从国际格局的整体角度把握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影响,同样推动了中欧关系和中法关系的同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法国的外交环境面临巨大的挑战。统一后的德国实力和影响都全面超越法国,苏东集团的瓦解使得法国在超级大国之间保持独立性的空间大为缩小。法国做出的务实选择是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借助欧洲联合适应多极化趋势。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的发展,欧盟和中国作为多极格局中上升力量的态势日趋明显,中欧关系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法关系和中欧关系互相促进,取得长足进步。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多极化势头不可阻挡,国际社会围绕伊拉克战争出现了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对抗。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上升的国际地位使得中法关系在反对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下得到巩固和提升。其次,全球化使得国际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加剧,中国发展的速度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西方的估计,中欧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法国等欧洲老牌发达国家难以适应调整,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上升,一方面保持对中国的战略重视,但另一方面在具体政策领域则转向维护自身利益,更多将中国视为竞争者。因此,近年来中欧关系和中法关系中的摩擦有增多趋势。第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实力地位进一步增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改变世界格局的主要力量。而欧盟深陷欧债危机困境,对外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中国在中欧关系中的主动性大为增强,对华关系则成为欧盟及成员国必须处理好的外交重点。因此,在欧洲一体化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中欧关系和中法关系的大局仍保持稳定,表明双方关系稳定性和成熟性已经达到新高度。

三 从欧洲一体化发展看未来中法关系

时至今日,欧洲一体化已经成为影响中法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并将对中法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随着《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及欧债危机的演变,欧洲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欧盟在对外政策领域加强协调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今后一段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持续演变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中法关系将出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法关系的战略基础不会动摇

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没有地缘政治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共同点多于分歧点。中法都主张世界多极化,通过多边主义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立场。当前,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势头加速发展,中法都认识到欧盟将是未来多极化中的重要力量,欧洲国家要保持发展,要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只能走联合自强的道路。只要这些双方关系的战略共同点不会改变,中法关系的战略基础就不会改变。

(二)中法合作将继续向深度广度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欧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欧盟及其成员国面对金融和债务危机的打击,加强对国际伙伴的借重以摆脱困境是必由之路。近期,欧盟对中国发展的评价更加积极,对中国国际地位更加重视。未来,欧盟将继续寻求深化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重要的领域内加强同中国的对话,以期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同欧盟合作,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国作为欧盟内的大国,在中欧联系更加紧密的背景下,中法对话与合作的领域和程度也必然随之加深,特别是法国在非洲、防务、能源等领域有独到优势,可以为双方合作创造更大空间。

(三)中法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同步发展

法国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受到德国的竞争和压制,将施力点转向对外政策领域的态势明显。近年来,法国在国际问题上冒险、干涉的一面明显增强,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影响不可小觑。一方面,法国重视借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协调;另一方面,中法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对双边关系造成消极影

响。中法在国际上合作与竞争同步上升的态势有可能长期化。

(四)中法之间的利益摩擦由于欧盟因素可能更为复杂

当前,中欧之间的利益摩擦处在上升期,深受经济萧条困扰的欧洲经济界对于打开中国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升值等问题上有强烈的利益需求,这些领域将是中欧未来的矛盾焦点。随着欧盟机构利用《里斯本条约》的规定和债务危机的刺激,不断扩大对成员国货币、金融领域的控制和监管,中法关系在相关领域的利益纠葛必然受到欧盟法律制度的影响和欧盟机构的制约。此外,法国重视价值观的传统,在中欧发展模式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纠纷也可能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林旺民. 欧盟成员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化[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0(3): 91-96.
- [2] 张锡昌, 周剑卿. 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 [3] 张锡昌. 中法建交40周年再回首[J]. 外交学院学报, 2003(4): 35-41
- [4] 苏平, 喻坤鹏. 希拉克的欧盟政策[J]. 理论界, 2006(1): 209-212.
- [5] 王朝晖. 新时期的法国外交政策及对华关系[J]. 现代国际关系, 1999(10): 23-26.
- [6] 《国外理论动态》记者. 中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访谈[J]. 国外理论动态, 2009年(4): 1-5.
- [7] 张骥. 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J]. 欧洲研究, 2012(5): 29-45.
- [8] 王朔. 奥朗德政府的对华政策[J]. 国际研究参考, 2013(6): 18-21.
- [9]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597.
- [10] 新华社. 习近平同奥朗德举行会谈[EB/OL]. (2014-04-2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25/c_115546802.htm.
- [11] 郑启荣. 全球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95.

责任编辑: 骆晓会